

系，并为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创造了广阔的实践空间。

第三，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思维和理念。数字思维是能够改变甚至颠覆认识世界的思维。一方面，数字思维体现了中心化思维和平板化思维的统一。数字化世界的特征是万物互联，控制世界的权力高度集中；同时，处于每个节点的行为体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其他行为体形成制约，并使世界展现出平板化的一面。另一方面，数字思想体现了创造性思维和破坏性思维的统一。从创造力来看，数字技术大大提升了行为体的行动效率，数字化程度高的行为体也更易于在国际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从破坏力来看，掌握先进数字技术的行为体可以发起数字制裁和攻击使其他行为体权益遭受巨大损害。这是一种负向权力，但它在数字时代更加凸显出来了。因此，以数字思维观察世界，我们对国家与市场等基本要素及其关系的认知都会发生深刻变化。

第四，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权力和利益。数字空间是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新疆域，其中包含的数据要素与传统的物质化的要素不一样，与精神上的要素也不一样。它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高度联动的复杂要素。数字与传统意义上的行为体权力和利益相融合，使各行为体在一些领域的权力和利益的界限变得模糊，并形成共享权力和共容利益。这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现实基础。

总之，数字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既面临来自现实的挑战，也迎来了创新发展的机遇。无论从当前还是从未来看，将数字方面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也更符合我们所处时代的需求。

百年变局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钟飞腾*

从字义看，“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可以分为“国际”（I）“政治”（P）

*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依据笔者2023年4月16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会暨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2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而成，笔者感谢王正毅教授的邀请及与会学者的评论。

“经济”（E），这三种学问在西方社会科学门类中是单独成科的。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是现代社会科学创立的时期。以美国为例，从1885年至1905年的二十年间，全国性的经济学会、心理学会、人类学会、政治学会和社会学会相继成立。^①在西方的大学和学科分类系统中，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属于政治学之下，公认的创立时期是1919年，而作为一门学科的IPE则被认为从属于国际关系学，创立时期是1970年。与社会科学中几门相对成熟且创设时期较早的学科相比，国际关系以及IPE都有明显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特性，真正属于本学科独特的基本概念以及基本规律是比较少的。由此导致的一个难题是，往前追溯IPE的学科发展历史时就容易进入其他学科领域，学科思想演变的线索盘根错节。20世纪是中国国力由衰而盛的一个时期，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也是跌宕起伏。

一 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时期政治经济学 转向经济学、政治学

准确识别西方IPE的学术发展脉络并抓住其核心要义并非易事。西方的学术和学科不是天生为中国的发展而准备的，而中国直到最近四十年国势上升才开始系统性地研究和发展有关“国际”的学问。20世纪中国几代学者在向国人传播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等学术概念和学科体系时曾发生过偏差。例如，20世纪初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但该书在半个多世纪里并不曾在中国有任何重大反响。

陈焕章于191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按英文直译是《孔子的经济学原理及其学派》。几乎一个世纪后，这本博士论文才以《孔门理财学》为名出中文版。仅从中译本的书名看，我们较难识别陈焕章模仿和借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思想。马歇尔出版于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是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最为权威的教科书。1903年，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席的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建立“经济学与政治学系”，将经济学纳入本科课程，“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课堂中逐渐成了“经济学”，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则单独发展成了政治学。

^① 钟飞腾：《百年大变局、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学科的起源》，《东亚评论》2019年第1期，第24页。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转向“经济学”“政治学”独立分科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秩序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先行者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1921年10月，孙中山完成《实业计划》一书，提出借助国际资本力量发展中国。在该书的结论部分，孙中山则强调，“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① 1929年，宋子文在该书英文版第二版的序言中认为，资本更多流向了欧洲，而不是更需要的其他地区，欧洲甚至出现了对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警告。^② 孙中山的构想没有得到欧美资本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人对“国际”的了解还有待深入。帝国主义之间的权势竞争对欠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极其重大的，而关于这类知识的系统总结是二战以后由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依附论等 IPE 的思想流派完成的。尽管如此，在西方学术界，孙中山被誉为“‘国际发展’概念的先行者”，“第一个呼吁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人”“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③

20世纪30年代，世界受到1929年“大萧条”的严重冲击，中国国内掀起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说得到很大的传播和发展，自由主义理论相对受挫。1930年中国教育部设立了统一的大学科目表，西方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最终进入到高等教育体系中。^④ 日本入侵中国再度改变了中国思想界的方向。1938年，由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本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生活读书出版社公开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关于“国际”层面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的分析，给中国学者带来了很强的启发。

二 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

1947年，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上海出版，到1963年先后出版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281页。

② Sun Yat-se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29, p. viii. 第一版出版于1922年。

③ 埃里克·赫莱纳：《布雷顿森林被遗忘的基石：国际发展与战后秩序的构建》，张士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5—188页。

④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四部分。

过5版。从知识原创性看，胡绳在这一著作中发展的思想，丝毫不弱于阿尔伯特·赫希曼1945年在《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结构》一书中提出的“依附论”思想。^①1978年，胡绳在该书第6版中曾这样回忆：“（政论文章）这种情形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②胡绳的上述论断与早期依附论学者向拉美国家提出的与发达资本主义体系“脱钩”的建议如出一辙。中国学者注意不多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依附论的第二代学者已经发展和改进了依附论。例如，在美国布朗大学任教的彼得·埃文斯1979年出版的《依附性发展》一书，已经开始部分否定依附论第一代学者的主导性范式。^③

1979年3月，访问美国回来后不久，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如此关注这几门学科建设和研究，其重要背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④由此开始，中国学术界建设“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1981年初，《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宦乡和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有关重新认识列宁的“帝国主义的垂死性”的学术争鸣文章。宦乡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维护和论证《帝国主义论》中每句话的正确性，而是以它为指针，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甚至也不能拘泥于列宁根据当时情况所得出的个别结论。”^⑤

①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5.

② 胡绳：《六版序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③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④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181页。

⑤ 宦乡：《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第90页。

1983年,钱俊瑞主编的《世界经济概论》上册出版,其主要目标是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并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①该书是按照教育部和人民出版社共同决定的《大学世界经济丛书》编写出版计划编写的,组成《大学世界经济丛书》编委会的学者和专家均是一时之选,除浦山之外,7名委员均出生于1910年代,如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时任辽宁大学副校长宋泽行、武汉大学教授吴纪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褚葆一。这批学者多数为解放前在英美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其中,陶大镛和滕维藻还是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的成员,而宦乡和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则是法学评议组成员。^②

略为遗憾的是,当这批学者获得机会于20世纪80年代初主持推动世界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时,多数人的年龄已过60岁,钱俊瑞更是年过70,且因十年动乱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追踪西方学术界的动向^③,因而并不了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IPE这一新兴的分支学科。钱俊瑞和陶大镛反复强调要建立一门不同于“国际经济学”的世界经济学,出发点是解释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但限于当时的开放条件,中国经济学界并不知道沃勒斯坦在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已提出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演进规律的相关学说,反而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提到了“世界体系论”。^④在引进西方学术著作时出现学科错位的现象在当时并非个例,原因之一是这个时期也是西方交叉学科兴盛的一个时期,中国学术界在引进西方学术作品时往往并非沿着学科路径前进,更多是社会需求使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国内高校开始建立经济学院,将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学并列,分属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世界经济学科建设上出现的一个新争论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关系,有的主

① 钱俊瑞主编:《世界经济概论》(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5页。

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人民日报》,1981年6月14日,第2版。

③ 1979年11月,钱俊瑞在成都召开的美国经济研究会年会上曾表示,“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和外部世界几乎处于一种完全隔绝的状态。研究机构被解散,人员被下放,研究工作差不多完全停滞了。这使我们和国外研究水平的差距扩大了10—20年。”钱俊瑞:《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而奋斗》,《世界经济》1980年第3期,第1页。

④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4, 魏章玲:《美国社会学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第134页。

张两者不可分^①，有的则认为“世界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应该有与其他学科严格区别，它不应该包罗万象”。^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钱俊瑞、宦乡等老一辈学者相继去世，世界经济学以及政治与经济不分家的学科建设思路也发生了转变。

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与经济的重新关联

在世界经济学学科建设转变之际，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国际”（I）以及“经济”（E）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对推动中国的IPE研究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中国学者陆续介绍了西方IPE的代表性论著及相关理论，如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和1990年分别出版了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苏珊·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事后来看，这两项研究分别代表了IPE研究的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③ 1991年，罗伯特·吉尔平、迈尔斯·凯勒、宋新宁等知名IPE学者应袁明教授邀请到北京大学参会讨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④ 20世纪90年代，IPE作为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教学的相关课程在中国著名大学里得到广泛传授，但并没有纳入教育部的专业目录。

2001年中国加入WTO对IPE的发展影响深远。2003年在王正毅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大学积极推进IPE本硕博专业的建设，系统性地发展了IPE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美IPE研究第二代学者参加的一次会议上，美国IPE的第二代学者戴维·莱克在“开放经济学的政治学”（OEP）视角下专门讨论了中国与开放经济学的关系。莱克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学者关注的大问题之一，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的崛起。但从学术的角度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作是

① 宦乡：《关于世界经济学科的建设问题》，《世界经济文汇》1986年第5期，第1—7页。

② 张永东：《目前世界经济学教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世界经济研究》1986年第3期，第78页。

③ 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版。

④ 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全球比较优势格局的一次重大转移”，因而“中国大多数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及其对其他国的影响都可以用 OEP 来解释”。与此同时，莱克也强调，“中国的崛起的确凸显了 OEP 研究在国际市场力量与规模收益递增这两个假设上的局限。”^①

对 OEP 两个核心假设的挑战是中国 IPE 知识创新的来源之一。第一个是“小国经济”假设，认为小国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接受者，而麻省理工学院戴维·奥特尔等人自 2016 年以来发表的关于“中国冲击”的系列论文表明，中国有很强的能力改变世界市场的价格。^② 2018 年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表明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对外政策。^③ 第二个假设是规模收益不变，但规模经济贸易已经表明利益不能被当做是政治的外生变量，而是政治的产物，最典型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时产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国学者在 80 年代初推动“世界经济”建设时即有所强调，如陶大镛指出，基于比较成本理论的所谓各种国际贸易纯理论只是李嘉图体系的翻版，各国即便按照相对低的成本进行贸易，也不可能让所有参与者互利。^④ 中国人民大学田野教授 2022 年发表的《大国竞争的根源》一文则强有力地表明，大国关系中的报酬递增机制在地缘竞争、技术竞争以及国际制度竞争上均发挥重要作用，因而不能被忽视。^⑤ 中国与美国实力地位的进一步缩小，挑战了 IPE 第二代学者的诸多假设和理论成果。这一点正如本杰明·科恩在新近出版的《反思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 IPE 研究，已转变为一个更加开放和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创建一个真正的本土版 IPE 的势头正在增强”“中国 IPE 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普遍强调国家的中心地位”。^⑥

① 本段中的引用均来自戴维·A·莱克：《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郎平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8 期，第 55 页。

② David Autor, David Dorn & Gordon Hanson, “O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China Shock,”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2, 2021, pp. 381–476.

③ 钟飞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升级》，《外交评论》2021 年第 2 期，第 1—36 页。

④ 陶大镛：《论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2 期，第 105 页。

⑤ 田野：《大国竞争的根源：基于报酬递增机制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9 期，第 85—103 页。

⑥ Benjamin J. Cohen,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2, pp. 63–65.

四 百年大变局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角度看，中国的 IPE 发展已经从模仿转向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成为中国 IPE 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反映出崛起的中国与处于重大转型中的世界的互动——“国际”“政治”“经济”三方面的显著而且深远的变化。^① 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及其团队开发的数据显示，按 2011 年可比价格，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过去 120 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1900 年中国人均 GDP 不到 1000 美元，仅相当于英国的 12.8%、美国的 12.1%；1929—1938 年，中国的人均 GDP 与 30 年前持平，仅相当于英国的 10%；（2）二战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人均 GDP 占美国比重下滑至 5% 左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人均 GDP 逐步上升，至 20 世纪末翻了一番，占英美的比重又开始超过 10%，中国的相对发展水平告别了 20 世纪；（3）21 世纪初以来，中国人均 GDP 有巨大的提升，至 2018 年超过 1.3 万美元，相当于英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四分之一。^②

将上述三个阶段的人均 GDP 相对水平的变化轨迹与学术思潮的阶段性变化联系起来看，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发展水平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也是我们学术思潮转轨的阶段。当前，中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国际”部分发生首当其冲的变化，从过去单纯地参与国际大循环逐渐转变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正在快速接近美国，西方战略界人士普遍担忧中国经济实力也在快速转变为地缘政治影响力，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在发生显著的改变。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强调的，原本被视作外生变量的外部环境现在需要加以内生化。^③ 在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的前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均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因而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 IPE 研究也会继续呈现新的面貌。

^① 徐秀军：《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一项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7 期，第 4—34 页。

^② 数据来自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增长和发展中心提供的麦迪森数据库，<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

^③ 2023 年 4 月 15 日，张宇燕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会暨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 20 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内容。